

使德日記

譯者 朱 · 著者 陶大德

使 德 日 記

陶 德 大 使 著
朱 雯 譯

謝晉元日記鈔

朱 雲 編

抗戰史上最
光彩之一頁

描寫孤軍營生活內幕
發揚大中華民族精神
紀念抗戰唯一的手冊
革命軍人最好的典範

——欲知英勇抗戰詩史不可不讀——

(每冊定價二百五十元)

正言出版社刊行

序

一九三三年春天，羅斯福總統所派駐各國的使節中，其直接於美國關係最爲重要者應以駐柏林大使爲首。各使節所需應付的問題中，再沒有像他所遭遇的政策上、行爲上、交涉上、和精神上種種問題那麼的棘手。自從十九世紀末葉德美兩國之間發生了商業競爭以後，彼此之間的外交關係上常受到磨擦和爭執的干擾。美國之參加對德戰爭更引起了向日的仇恨。一九二九年所發生的經濟危機使一切調整兩國之間外交關係的企圖盡歸粉碎，尤其因爲德國政府、銀行、和公司都無力償付在美國方面新近所欠的鉅額債務。在這種種的積壓之外，並加上兩國中銀行業和工業之崩潰所產生的緊張，和阿道爾夫·希特勒之突然入掌柏林大權，於是嚴重的後果，當時雖尙無從覺察，然而不免將會從這次「虛無主義之革命」中滔滔而流出了。

雖然在已經過了七年之後，我們已無從再回到當時所懷的心境，有幾件事實依舊在紀

錄和記憶中翹然不會磨滅。一月間，希特勒入任內閣總理，在一個分裂而民心又極其不安的國家裏做一個集中政府的首領。在最初的幾個月裏邊，他的命運很爲難說，絕無把握。這位新總理，四周有一批很有權力，專想控制和利用他的徒衆包圍着他，前面又對峙着一個沉浸於傳統思想，極端反對他的進步和政策的貴族政團，於是他的前途變爲十分渺茫，連自己也無從看得清楚了。他也許將被迫而作保守式的反動。他也許將利用極左或極右派的力量而成爲德國之專制主人翁；這都在兩可之間。他是一個不顧一切的危險人物，這是在一九三三年的春天大家便都已知道的，但因前途的遮幕還未揭開，外交界中便以爲某某幾種應付他的政策都可以應用，就是華盛頓的國務院當時也抱着這種思想。

在這個混亂和漸趨敗壞，再夾着緊張的局勢中，羅斯福總統即覺得對於這個駐德大使的人選不能不格外鄭重。他很易於從一九三二年中以鉅款捐助民主黨選舉運動那批富翁裏邊去挑選一個人才。但從這個圈子裏所選出來的勢必是一個金融家、一個有錢的律師、或一個擁有巨額財產的軍人——都是些不熟悉歐洲政治，大概難免要利用大使署的地位替美

國佔主索取債務，或替美國商人兜售可供軍警車備之材料的人物，而他們必又藉此時時大張謠會，盡情揮霍以示奢豪。

還有一類可能的候補人物，則是美國外交機關中的「職業」人才——都是些對於外交技術多少已受過訓練的常役公務人員。他們對於一切例行手續、慣例、和儀節自然都很熟悉，然而他們究竟不是單純的專門人才。因為，有資格充任駐柏林大使的職業人才大都本人是富翁或太太很有錢；他們懷着很大的野心，或則太太很有野心。惟有不知道內容的人們，纔會將他們當作很可以代表國家利益的客觀人才。

在這兩種人才中，倘羅斯福總統覺得選不出適當的人物，則他還有一條選拔的路徑。想到這一項使命之很爲困難，他自然在良心上覺得應該從熟悉德國語言，熟悉德國歷史、文學、政治、政策、傳統習慣、和生活的美國公民之中去選拔一個最適宜的人才。這就是說，他須從學術界中去選拔，因為德國歷史、傳統習慣、政策、和生活之知識，都是必需身居德國會作過多年研究的人纔能得到的。

在這一點上，羅斯福總統也有先例可援。歷史家喬治·班克勞甫，德國戈亭根大學哲學博士，曾在普法戰爭和德意志帝國成立的緊張時期中任過美國駐柏林公使。曾在德國作過研究，『科學對神學戰爭史』著者，美國歷史學會第一任會長安德魯·懷德，也會在東西戰爭的緊張時期中任過駐德意志帝國的美國外交代表。

有了這些先例在前，再加上國內的情形如此不安定，國際間的局勢又如此的混沌，羅斯福總統似乎是受了國務院商業部長但尼爾·羅柏的勸告，便效法前人之所為，再度從學者之中去選擇一個德國的外交代表——當選者就是芝加哥大學的歷史教授威廉·陶德。陶德雖在政治上沒有像班克勞甫或懷德那般活動，但有資格作評斷的人們都公認他為美國目前最偉大的歷史學家之一，兼富有才能的作家和教授。他已被推定於一九三四年繼任美國歷史學會的會長。讀報紙的人們在聞到陶德之被任為駐德大使時，也許對於他的學者成績沒有什麼印象，但此次選拔，確係顯示羅斯福總統因企圖和新德國政府樹立一種良好的關係，而特地不拘常例破格用人，擇取一條特別的路線。

這條路線，結果雖沒有館如所期，但確已是求同情於德國文化界之最近的途徑。陶德這人確是最宜於作這種求取同情的的工作，同時也最宜於作美國的民主傳統思想之代表。他的祖先是英國人，在一八六九年生於北加羅里那州的克萊登地方，他是佛奇尼亞工藝學校畢業生，從德國來比錫大學得博士學位，是在一九〇〇年經過三年的刻苦研究，於著成「湯麥斯·的弗遜於一七九六年回上政治之途」那篇論文之後纔獲得的。他在蘭道夫·馬康學院教讀了八年之後，即於一九〇八年受芝加哥大學之聘，此後他即專心於美國歷史一門之內作研究、教授、和著作，不過同時也依舊很注意於他早年所愛研究的歐洲時事。

他生長於崇信浸禮教派的家庭，所以他屬於羅傑·威廉士思想的一派——教會和國家之分離、宗教自由、和天良自由。他於一九〇一年娶北加羅里那州奧本地方的瑪莎·約翰士爲妻，這一項結合使他格外傾向上面所說的那一派主義；他這位太太是一個具有同樣精神、崇尚理想主義、活潑、和藹、富於理智的人。他在幼時即已取得的愛好自由思想，由於太太的同情和忠懇之灌漑，自然越加深固，再加上他對湯麥斯·傑弗遜的生平和著作所

作的研究，越使他這種思想時時蓬勃於心。因此，由於性情和訓練，他是屬於美國政治學之特殊派；不過，他因在歷史編纂法上已受過訓練，所以他從不會以自己的偏好和整個歷史混爲一談。他也沒有想像到民主主義的敷說，經過湯麥斯·傑弗遜，安德魯·傑克遜，胡德魯·威爾遜，或富蘭克林·羅斯福等人物之後已可告結束。他對於這些事情都不過作單純的「客觀」，我在這裏用一個他那個圈子的人所慣用的名詞。

陶德之確實具有平心靜氣地以透視的方法檢討歷史、檢討本人和其成績的本領，這一點，我就可以替他作證明，因為我和他的友誼已有三十餘年之久了。我們見面時，常以談論學術爲消遣，彼此每喜以各人的「偏見」作互相譏嘲的資料。我每次隱約提到他的偏於信仰傑弗遜主義時，他總回報我說，像我這種出身「聯邦主義——進步——共和派」的人似乎總還够不到對這個問題下什麼公正不偏的斷語。他在用嘲弄的口吻，夾着一些幽默的辭令批評我所信奉那派主義之「財閥政治」的傾向後，也常會很高興地以微帶不自然的態度問我對於傑弗遜民主主義時代的「奴隸政治」抱着怎樣的意見。在用這種遊戲口吻開場

之後，他即會運用他的廣大學識，平心靜氣地討論自從漢彌爾頓和傑弗遜以後，分立於我們這個共和國裏的黨派和其利害關係。他之所以能在歷史研究中心平氣和以從事者大半是由於他深信民主主義尚在進行的過程中，還沒有達到終點，而最艱巨的工作還在後頭。對於這一點，他最愛用的一句話就是：「民主主義其實還沒有經過鍛鍊哩。」

在他生平所寫作，關於歷史上的問題，歷史上的人物，並包括種種歷史上的利害關係之論文中，他對歷史研究最大的貢獻就是對於「古代南邦」之研究。從他所寫幾本大部著作裏，我們都能看出他是何等的着重這一方面：「那森尼爾·馬康傳」（一九〇五年）；「傑弗遜·台維斯傳」（一九〇七年）；「古南邦之政治家」（一九一一年）；美國史料「河畔叢書」裏的「擴充和衝突」（一九一五年）；「棉花國家」（一九一九年）；和「古南邦使彙」，其第一年「爲民主主義之奮鬥」是他在柏林之任時於百忙中所寫成，出版於一九三七年。「胡德魯·威爾遜及其偉績」一書（一九二〇年）和他與雷·斯坦那·貝克合編的「胡德魯·威爾遜之公報」（一九二四——一九二六年）雖不屬「古南邦」史話

的範圍，但裏邊所含的依舊是『古南邦』傳統思想，不過目前已經國家化罷了。但他最偉大的史學傑作終究要算那部『古南邦史彙』，這部書共有四集，在他去世時還有一部份尚未寫成，這就隱示他對於南邦是怎樣始終戀戀不捨。這部書的主旨是在詳細討論當時那個社會制度裏邊的經濟、文化、和政治之特點。

在陶德這多年的致力於學問中，他的大部份精力依舊是費於教授學生。他的教授法極富於效能。他不像普通的學者一般把學生們當作一種足以擾亂他個人工作的厭物。他對學生，不論智愚，總是循循善誘，不惜工夫，從不顧到自己所受的犧牲。他在教授時專主誘導學生發揮自己的本能，由於他性情之和藹，他極為學生所敬愛；由於他的教授方法之優良，學生們的頭腦都變得銳利。他具有講述史事的天才，能講得活龍活現如同當天所發生的事件一般。他生性好學不倦，最努力於工作，無論什麼外來的攪擾，或年齡之增加都不能改變他的初衷。

他雖是一位偉大的教師，但他從不企圖使學生們都變為他的信徒，他甯可讓學生們各

自選擇本人所喜的途徑，各自去作向前的進行，聽任他們隨意批評自己的見解。這也是深植於陶德心底裏的一種自由思想，他從不願意做一個武斷派的教師，雖然他對自己所信仰的事物則心旨堅定從不游移。由於職業的需要，他本來很有投身黨派的可能，但他天性是一個包容忍主義者，很明白人類的缺點和能力上的限制，所以隨時肯以自己所應享的權利分讓給旁人，絕不計較。他的行為之正直，對工作之努力不倦，可以猜想到他必極其服膺歌德詩中的兩句話：

「當我們向前瞻望而看到應做的事情還有那麼許多件沒有做成時，我們便會覺得我們的區區成就實是渺小得等於毫無一物的地位。」

在他一切個人的交接中，不論和同事、學生、家屬、或高級官員，陶德乃是一個十足美國式的民主主義者。他生性不近富貴；從不作獲得高官厚祿的想頭，也從不知順着潮流去求取富貴。在他的心目中，一個人之是否有價值，並不是以財富為標準。無謂的消耗以示豪闊，那是低級的行爲，在他的眼光裏都是有害於知識寶藏和有用生活的東西。他自擊

着財富的集中，使他感到共和國的安全將因而發生危險，因而使他又致力於研究平均財富的辦法——正如但尼爾·韋勃斯德早就說過的話：這纔是民主政體的真正基礎。

陶德之思想，雖比胡德魯·威爾遜更傾向民主，頭腦雖比較更能順應環境，然而他始終崇奉這位大政治家的觀念和政策。在忠實的信徒人數已漸漸減少之時，祇有他依舊堅信民主主義能以和平也許終可以成爲世界的生活之道。他覺得沒有第二種哲學能供給比了這個所供者更好的偉大信念和崇高活動之基礎。

這些，雖然不過是幾句非常簡單而又只是片段的描寫，就是一九三三年春天羅斯福總統選任爲希特勒早期握權時代駐柏林美國大使那位人物的生平小史。照當時的外交線路情形而言，陶德在學識、訓練、和性情上確是一個最爲特別適宜於這個位置的人才。他之矢忠於美國民主主義之順應人性的傳統思想，是完全無可置疑的。他對古德國諸優點之敬意，和他對德國民衆的熱情，都早已深植在他的性格裏邊。

不過陶德終是一個凡人，自然也難免有錯誤的地方，然而他並沒有爲了貪圖索回舊債

那種糊塗事情而犯採取綏靖手段的錯誤。倘若換了一個較為着重「實際事件」的人，則也許能暫時從德國金融家和德國政府的手中，獲得較多一些可供償還美國方面債務的外匯，雖然在事實上這也依舊渺茫得很；但是陶德的使命是在設法加強和團結其時確正處於無所適從的地位，然而猶未爲總理希特勒和他的黨徒以高壓手段加以組織的那批德國社會中的溫和份子。這件工作也許從頭就是毫無希望的。不過對於這種有關政治和道德的問題，我們單靠着一些歷史學知識終還不够去下什麼定評。無論如何，陶德至少能用一種別人可以悟解的辭令和精神去向德國知識階級的領袖和德國外交部裏的哲學博士談話，甚至在他們的命運已快要注定的時候。

爲了紀錄忠實起見，我們不能不承認在大體和小節上陶德都有受人批評的地方。他的簡單生活方式，他的談吐中之率直和坦白，他的思想和舉動中之深染民主主義，他對受桎梏的德國之憤怒，和他對外交界嚴格規則之疏略，在本國和外國外交界人士的眼光中都認爲是使他在辦理交涉中失敗的因素。

我們承認：他爲了專主用溫和的勸告，所以未能阻抑希特勒之擴張其權勢。他雖已很爲努力，但依舊未能阻止納粹之虐待猶太人。他未能完全收回德國所欠美國方面的各項債務。他雖已費了許多氣力，但始終未能打開德美兩國之間的商業僵局，而創造起一個彼此繁榮的時代。他未能打破歐洲之外交難關，未能恢復列強之攜手合作，未能阻止他早已料到的戰爭。他也不能使許多在德國境內希望本國出力保護他們作種種活動的美國人滿意，因爲他覺得這些活動都不符美國的傳統民主思想。這些都是他的極聰明的無需證明的失敗之處。

但是，試問在納粹德國那種環境裏邊，美國所派去的外交代表，不論是職業或非職業人才，有誰能夠到所規的目的？還在第一次歐戰爆發之前，歐洲各國間的歷史交涉，那一次不是由滯礙外交規則、輔以大把作理人員的職業外交家所經手辦理？但是他們可也有什麼成就嗎？從一九一四年以後的歐洲情形，我們對於上面這句問話，很易於作不寬泛的答語。當陶德在柏林的時節，許多有錢的美國人，也在別國的首都裏任着同樣的位置。以這

批人的成績而言，如果把他們和陶德互換一個位置，他們可會有什麼成就嗎？歷史已經供給我們一個答案了。

陶德之成績和智慧是在這種透視中顯出了它的價值。在當時的外交界裏邊，連美國籍和非美國籍者在內，對於時局潮流之已經怎樣趨向以後幾年中所實現的悲劇，他比任何人看得清楚。不論旁人怎樣以『恐慌主義派』和『神經過敏派』的頭銜去嘲弄他，總祇有他預先料到德義日三國如若不由她們的鄰國以協調的行動去阻止她們，則她們終必要走到肆無忌憚那條路上去的。他已算定綏靖、勾結、和因循政策的結果，必是一次可怕的爆裂，而他也曾盡其全力企圖加以阻止。陶德在奉使就任之初即已知道蘇俄必將在歐洲事件中做一個重要的角色。到了現在，事實的演變已證明他這句話是怎樣的確切。再則，在他的力量所不能控制的旋渦中，陶德從不像以前美國的外交人員一般，以美國將出頭幫助那句話胡亂去欺騙旁人；他從不用虛誕的諾言去引起沒有頭腦和不謹慎者的誤會。

其他姑不置論，他對本國和歐洲各國，總還沒有犯美國外交代表所最易犯的一個大毛

病：他從不對駐柏林的各國代表發空泛不負責任的言論，致使他們誤會如有變故發生，美國即會以全部兵力和財力出來相助，因而引起他們取冒昧自招大禍的行動。在這一點上，他確能時顧全本國民衆的利害，並也顧全了歐洲各國民衆的利害。

陶德這本日記裏邊所載包括從他就任之日起到離任之日爲止，中間的一切經過，其實也就是當時一切政策、方式、和動作的證據大全。但其價值實在還不止此。這裏，我姑且用一個譬喻吧，它把一道亮光射進了從一九三三年七月間到一九三七年年終時，正當阿道爾夫·希特勒鞏固和擴張他在德國境內的勢力那個時期裏邊。在這次世界大變局裏邊，他所處的地位和同時的其他作家有些不同，因爲他正處身於柏林各項行動的幕後，而柏林則就是國家社會主義運動的重要中心。他和這次大變故中的重要角色全都認識，常和他們會談，所以對於他們的個性都能下直接的論斷。他常和德國政府的代表，和外交團中別國的代表，以及到柏林來的各國領袖人物，和美國公民，不論身份的高低，凡是來到德國在政治、經濟、或新聞事業上有所活動者接觸。他因爲是一個身預其事的份子，所以他有著就